

#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再考察 ——基于MEGA<sup>2</sup>第I/5卷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分析

田毅松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它能否得到科学论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合法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尽管存在所谓的“恩格斯主导说”,但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手。这一点既可以借助MEGA<sup>2</sup>第I/5卷的先行版和正式版在文献学上加以论证,也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和概念形成史的角度进行证明。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思想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 MEGA<sup>2</sup>第I/5卷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1]02-0036-06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1.02.00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认定大体上是确定的,一般认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sup>①</sup>。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巨大胜利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却日益成为一个问题:既有“对立说”,也有“颠倒论”,前者认为“恩格斯反对马克思”<sup>②</sup>,后者则提出“恩格斯才是第一小提琴手”<sup>③</sup>。人们似乎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文献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或者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进行了歪曲。除了在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与马克思思想相抵牾之处,他们要么忽视恩格斯为编辑马克思著作并尽可能保持其原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片面强调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掺杂了某种动机,因而出现了所谓的“恩格斯问题”;要么片面夸大恩格斯在他们合著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主导者。如果说前一种做法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的编辑过程中,那么后一种做法的典型代表则体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谁才是“第一小提琴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含有某种实践旨趣。如果能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费尔巴哈”章的创作作为个案,从文本和思想等层面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答,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

## 一、恩格斯如何成为第一小提琴手?——基于思想史的分析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曾明确且谦虚地告诉友人贝克尔“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sup>④</sup>这封信随后的内容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收稿日期:2020-03-15

作者简介:田毅松(1977—),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项目编号:310422107)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社会及其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16THZWLJ04)的阶段性成果。

①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基本上已形成共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南]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胡文建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版序言”第1页。科拉科夫斯基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阐发的两部分或三部分混成的一整块理论”。[波]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把后者从一个人道主义者改造成了一个机械论者。See Norma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Santa Barbara: Clio Books, 1975.

③这是一个看似温和但其理论消解作用却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和实践的合理性。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9页。

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的论述基本一致,都认为“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因为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因此他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所以恩格斯才坚持这个理论要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sup>①</sup> 尽管恩格斯的言辞有自谦的成分,但他的主张无疑是准确的,关于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小提琴手的定位也是合理的。实际上,以上是恩格斯对二人思想关系的整体判断,然而这一判断同样适合“对唯物史观的最初阐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但是核心内容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sup>②</sup>。

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体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不管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承认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sup>2</sup>)的推进和“马克思学”的兴起,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甚至出现了恩格斯“主导说”。

最早试图为恩格斯“正名”的是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作为《恩格斯传》的作者,他在本书中论述了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作用,认为“‘观念形态’的最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但经过了马克思的修改和补充”<sup>③</sup>。迈尔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他曾经在伯恩斯坦那里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从直观上看,这些手稿确实主要是恩格斯的笔迹。但矛盾的是,他在随后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魏德迈的笔记时,却认为“笔记不能成为辨别的标准”。当然,迈尔还试图通过一些语焉不详的论断证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先于马克思的,因为“恩格斯在英国已经感觉到了历史进化的路线,不过这种感觉,在他遇见马克思以后,才成为确实的坚定的理论”<sup>④</sup>。

如果说迈尔关于恩格斯主导说的结论还不十分清晰,而且在梁赞诺夫的驳斥下没有成为主流,但这种观点在部分学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编辑和研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学者广松涉和英国学者卡弗。

客观而言,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分担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广松涉的研究得到了MEGA<sup>2</sup>第I/5卷先行版主编陶伯特的关注,认为他的研究“代表了《I.费尔巴哈》编辑史上的一项科学编辑的成果”<sup>⑤</sup>。但是,广松涉根据他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一种与迈尔类似的观点,即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断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被误认为主要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原因是人们受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相关论述的影响。在广松涉看来,恩格斯的谦辞和马克思的论断应该通过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重新定位。除了其早期在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早于马克思外,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文稿(Urtext)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作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而定型化的诸论点”<sup>⑥</sup>。广松涉据此断言,“此遗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主要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sup>⑦</sup>。不但如此,广松涉还据此否定了梁赞诺夫之前在驳斥迈尔时提出的“口述笔记说”<sup>⑧</sup>。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③[德]古·梅尔《恩格斯传》,郭大力编译,读书出版社1948年版,第43页。需要注意的是,郭大力先生在这里将Mayer译为“梅尔”,本文统一改译为“迈尔”,同时对其中其他一些术语进行了改译。

④[德]古·梅尔《恩格斯传》,郭大力编译,读书出版社1948年版,第44页。侯才教授认为迈尔持马克思主导说,理由是恩格斯的誊抄内容是“事先商量过的某种成熟的想法”。(侯才《〈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释与新建》,《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不过,如果对此一结论的语境进行分析,我们很难得出侯才教授的结论,而且迈尔似乎更重视恩格斯在其中的作用。Siehe 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I),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1934, S. 226.

⑤[德]英格·陶伯特《MEGA: 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⑥广松涉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作为整个历史理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由此导致的革命等等,都属于恩格斯的论述,而且最后也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参见[日]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9页。

⑦[日]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⑧[日]广松涉《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过广松涉的观点所依赖的编辑成果本身遭到了陶伯特的质疑,认为“广松涉的文稿编排完全基于假设和多多少少有根据的猜测,总的说来,对流传的这些干扰缺乏说服力”<sup>①</sup>。如果论据存在问题,其结论显然就不能成立了,不过,这需要新的理论和文献证据来证明这一结果。

作为MEGA<sup>2</sup>研究的专家,卡弗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著作。根据他的研究以及相关访谈,卡弗是在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著作”的合法性,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它的作者问题。<sup>②</sup>但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却处处透露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他看来,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是更有影响力且更有才华的,甚至是更具有综合能力的独立作家”,而且具有“世界视野和政治天赋”,因此,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中的理论地位被低估了。在卡弗看来,人们即使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是马克思,也只表明“恩格斯在谁是主要作者这个问题上”体现了“大度”的心态。<sup>③</sup>据此可以合理推断,卡弗大体上认可恩格斯作为“第一小提琴手”的合理性。<sup>④</sup>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及其写作承担问题因“恩格斯成为第一小提琴手”的论断而似乎变得更加模糊。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尽管比这种观点稍显“温和”,虽然它们承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性地位,但却以为马克思辩护之名“详细”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任务分担,从而构造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观点的分裂。<sup>⑤</sup>遗憾的是,MEGA<sup>2</sup>第I/5卷的编辑者对这一问题的“悬置”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任务分工问题即究竟谁是“第一小提琴手”问题似乎成了未决的“一桩公案”。

## 二、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基于MEGA<sup>2</sup>第I/5卷的文献分析

梁赞诺夫尽管是列宁直接任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但他的这一任命是与其“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为基础的。除了MEGA<sup>1</sup>进入编辑阶段之后需要担负的行政工作外,梁赞诺夫更是直接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文献的“搜集、整理、辨识和编辑活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其编辑的最重要文献之一。<sup>⑥</sup>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问题,梁赞诺夫认为“仅仅依据笔迹难以正确判断在这一合著中两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因此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口述笔记说”,认为这一著作乃是“由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记下来的”。<sup>⑦</sup>

但是,梁赞诺夫的这种论断在当时应该说比较“武断”,因为即使他能够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但仅依靠文献的笔迹等证据是很难支持马克思主导说的。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诸多版本的编辑大多搁置了这一问题。比如,陶伯特对此的结论是,只能“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地位的作者”<sup>⑧</sup>。实际上,这是消解而不是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占主导地位,就需要更充分的文献学论证,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正式版,即MEGA<sup>2</sup>第I/5卷。下面我们试着从微观层面,即通过对MEGA<sup>2</sup>第I/5卷的文本卷(Text)和附属材料卷(Apparat)的分析,甚至借助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辨识,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介绍MEGA<sup>2</sup>第I/5卷在编辑时区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文字修改类型,它们是即时异文(Sofortvariante)和后续异文(Spätvariante)。即时异文指的是“作者因思路中断而中途放弃时或因变更思路时产生的异文”,包括“删除单词、替换单词、

①[德]英·陶伯特《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②赵玉兰《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新研究成果——特雷尔·卡弗教授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③[美]卡弗《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④当然,卡弗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论据,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代工业生产、人的生产和历史哲学等内容都应该来自恩格斯,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历史的论述,而这“可能源于恩格斯的历史著作以及他想继续写一本关于英国工业社会史的打算的影响”。参见[美]卡弗《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76页。

⑤比如,望月清司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对马克思“第一小提琴手”地位进行的辩护,但是,他在严格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任务分担时,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理论”(即马克思看到了分工的积极方面,恩格斯注重分工的消极作用)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和恩格斯的“所有制形态史论”),进而勾勒出了一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图景。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

⑥赵玉兰《MEGA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8页。

⑦[苏]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转引自[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⑧[德]英·陶伯特《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编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变更单词词尾、插入单词等方式”；后续异文指的是“在推敲已经完成的文章过程中产生的异文”，包括“替换文本（或单词）、删除文本（或单词）、补充文本（或单词）、援用文本或变更文本的顺序”等方式。<sup>①</sup> MEGA<sup>2</sup>第 I/5 卷在编辑时大量收录并甄别了即时异文和后续异文，这种技术上的完善为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提供了可能性。

不管是即时异文还是后续异文，它们都有助于明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但即时异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大村泉等认为，通过即时异文来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大体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对照马克思独著、恩格斯独著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即时异文出现频次上的差别；二是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出现的类型。

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次与恩格斯的《普鲁士出版法批判》等三篇文献以及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时异文出现频次的对比，大村泉等人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出现的频次和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接近，远远高于恩格斯独著文献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次。<sup>②</sup> 这就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风格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恩格斯自发性地……写成的”，它要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要么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对于第一种可能，这实际上与陶伯特一样是在消解问题。那么，如何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是“口述笔录说”呢？我们需要借助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的类型来说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即时异文，包括同音异义词的更改、冠词的改变和删减内容的复原。在我们看来，同音异义词的更改最能证明“口述笔录说”，下面举例证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 H<sup>5c</sup><sup>③</sup> 的第 [64] 页有这样一段内容：“Hieraus erklärt sich auch das Faktum das [ <daß ≥ ] man in der Zeit nach der Völkerwanderung überall bemerkt haben will, daß nämlich der Knecht der Herr war, und die Eroberer von den Eroberten Sprache, Bildung & Sitten sehr bald annahmen.”（“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情，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sup>④</sup>

在原始手稿 H<sup>5c</sup> 的 [71] 页同样出现了同类型的更改，即“Das jus utendi et abutendi selbst spricht einerseits die Thatsache aus, daß [ <das ≥ ] das Privateigentum vom Gemeinwesen durchhaus unabhängig geworden ist, & andererseits die Illusion, als ob das Privateigentum selbst auf dem bloßen Privatwillen, der willkürlichen Disposition über die Sache beruhe.”（“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jus utendi et abutendi] 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sup>⑤</sup>

上述两个例子涉及到了德语中两个同音词即定冠词（或关系代词）das 和连词 daß 之间的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属材料卷对文本卷第 [64] 页的这句话做了三处改动。第一处标注的是“Faktum [ <daß ≥ ]”。根据 MEGA<sup>2</sup> 第 I/5 卷的编辑说明，“< ≥”实际上是由“< >”和“/”组合而成，“< >”表示“减少（删除）文字”（Textreduzierung（Tilgung）），“/”表示“内容中断”（Abbrechung）。<sup>⑥</sup> 因此，“Faktum <daß ≥”具体指的是，作者在写完 Faktum 后的 daß 就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并且把 daß 删除。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关系代词的 das，用它来指代 das Faktum。《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属材料对原始文献第 [71] 页的内容也附上了修改标志

① [日]大村泉《〈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作者身份问题再考》盛福刚、陈浩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② 关于即时异文在马克思、恩格斯独著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频次的比较，详细资料可参见 [日]大村泉：《〈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作者身份问题再考》盛福刚、陈浩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

③ MEGA<sup>2</sup> 第 I/5 卷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分为 18 个手稿，分别用 H1-H18 表示。手稿 H1-H8 构成了“费尔巴哈”章，其中 H5 是主体，在广松涉等人的影响下，这部分又被称为“大束手稿”，但它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三部分构成，MEGA<sup>2</sup> 将其分别表示为 H<sup>5a</sup>（原始手稿的第 1-29，“鲍威尔批判的早期手稿”）、H<sup>5b</sup>（原始手稿的第 30-35，“作为‘第三章 圣麦克斯 D 教阶制’部分撰写的基地稿”）、H<sup>5c</sup>（原始手稿的第 40-73，“出自‘第三章 圣麦克斯 第二节 私有制、国家和法’的‘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仍然是片段和笔记整合而成的文献”）。Sie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5( Text),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 16, 60, 69.

④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5( Text),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 108. 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8 页。

⑤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5( Text),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 119. 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5 页。

⑥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5( Apparat),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S. 724.

“aus , <das ≥” 这意味着作者要把最初句中的 das 删掉 ,并改为引导从句的连词 daß。<sup>①</sup>

这种同音异义词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常出现的例子似乎并不重要 ,但如果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特点 ,那么这种修改恰恰能够证明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说”。以第 [64] 页的内容为例 ,其写作过程可推测为 ,当时马克思在口述 ,恩格斯作记录。当马克思说到 [das ]( das 和 daß 的音标) 时 ,恩格斯可能误以为马克思要说一个同位语从句 ,因此立即写出了引导从句的连词 daß。但在马克思口述完整句子后 ,恩格斯发现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指示代词而非连词 ,用它指代这个从句要修饰的名词 Faktum ,因此应该用 das。所以 ,恩格斯“即时”删掉了 daß ,修改为 das。第 [71] 页的例子与之类似 ,恩格斯以为马克思要说一个名词 ,因此着手写下了定冠词 das ,但马克思最终陈述的却是一个从句 ,所以恩格斯应该是立即删掉了 das ,随后将其修改为引导从句的连词 daß。这种修改情况在恩格斯同时期其它著作的手稿中几乎不存在 ,因此 ,这基本上可以作为文献学证据直接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口述笔记说” ,即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其它文献能够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比如 ,通过分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人之间的信件内容能够看到 ,“费尔巴哈”章应该主要是马克思的思想。<sup>②</sup>

### 三、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 基于思想史的分析

关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地位 ,除了文献学证明 ,还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逻辑层面来分析。换言之 ,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和写作动机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入手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首先从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切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对施蒂纳的批判 ,因为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但将费尔巴哈、鲍威尔甚至马克思作为批判的对象 ,甚至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 ,更重要的是 ,它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使用过的“现实的个人”理解为“纯粹的精神性”。所有这些促使马克思来承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写作工作来驳斥施蒂纳。<sup>③</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篇幅确实是在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但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把“最初论题”等同为“主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到底应该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 ,但“最初论题”却只能被视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驳斥。

从写作时间上看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撰写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鲍威尔的那部分内容。MEGA<sup>2</sup> 第 I/5 卷的先行版收录了一篇发表在《社会明镜》杂志第 2 卷第 7 期上的《答布鲁诺·鲍威尔》 ,而且这篇文章被置于篇首 ,编辑陶伯特将之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如果陶伯特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首先针对的是鲍威尔。<sup>④</sup> 根据陶伯特等人的判断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性和积极性。

即使从 MEGA<sup>2</sup> 第 I/5 卷正式版出发 ,即放弃将《答布鲁诺·鲍威尔》收入其中 ,也不能否定反驳布鲁诺·鲍威尔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目的。因为如果从写作时间的角度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 ,那么手稿 H2 到 H8 ,尤其是 H<sup>5a</sup>、H<sup>5b</sup> 和 H<sup>5c</sup> 的写作顺序大体是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撰写的 H<sup>5a</sup> ,即直接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那部分内容 ,而不是从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中抽取并调整到“费尔巴哈”章的 H<sup>5b</sup> 和 H<sup>5c</sup>。<sup>⑤</sup> 因此 ,这两点基本上能够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就是反驳布鲁

<sup>①</sup>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Band I/5( Apparat) ,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2017 , S. 935 , 940.

<sup>②</sup>侯才等人都关注到了这方面的证据 ,比如马克思在 1846 年 8 月 1 日致列斯凯的信、1847 年 12 月 9 日致安年科夫的信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474、497 页。

<sup>③</sup>侯才《〈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释与新建》,《哲学研究》2018 年第 9 期。

<sup>④</sup>陶伯特的编排是正确的。可能有人质疑这种编排方式 ,理由是《答布鲁诺·鲍威尔》作为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难以纳入作为“手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如果认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一个从“季刊”到“著作”的转变过程 ,那么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 ,这种观点仍遭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 ,理由或者是这篇文献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 ,或者认为它的价值不大 ,不应该纳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重要文献之中。然而 ,如果注意到即使是并不注重文献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等也指出了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因为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圣布鲁诺”章的部分内容是相同的。因此 ,决不能因为担心这种编排会贬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而怀疑其有可能成为“可怕的引起内部爆炸的逻辑炸弹”而否认它的客观性。

<sup>⑤</sup>Sieh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 Manuskripte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 ,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Hubman und Ulrich Pagel , De Gruyter , 2018.

诺·鲍威尔。

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来看,他们都是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发展出来的,而且最终都要清算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自我意识”哲学,其中鲍威尔首当其冲,甚至可以说他最早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交锋推动着马克思逐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犹太人问题”在思想交锋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一阶段是从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1842年)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1843年)到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12月);第二阶段从鲍威尔的“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述”(1843年12月、1844年3月)和“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1844年7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最后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从鲍威尔的《费尔巴哈的特征》(1845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sup>①</sup>可以说,后一阶段的内容都是对上一阶段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现也就有了必然性。然而,马克思早期的这段思想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他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从恩格斯的角度看,恩格斯在同时期撰写的文章中尽管也会涉及鲍威尔,但他很少成为恩格斯全面批判的对象。

或许有人质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指向的是费尔巴哈,这与批判鲍威尔并没有关系。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要把“费尔巴哈”章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原因是他们要对鲍威尔在《费尔巴哈的特征》中批判《神圣家族》的内容作出回应。《费尔巴哈的特征》的主题是费尔巴哈哲学,但它在评论《神圣家族》时认为,马克思只是费尔巴哈的“继承人”<sup>②</sup>。由于《神圣家族》主要是马克思写作完成的,因此可以断定,鲍威尔的批判对象应该是马克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表现得很愤怒,因为鲍威尔显然有意贬低马克思的批判及其理论价值。但是,要彻底反驳鲍威尔,批判的矛头就不能再仅仅指向鲍威尔,而是要批判确实需要重新评价的费尔巴哈哲学,通过对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来证明自身哲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应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还证明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同样,这也说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动机,那就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来实现对鲍威尔的驳斥,同时确立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

此外,从概念形成史的角度也可以证明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如上所述,“现实的个人”是施蒂纳指责马克思的关键,同时它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完善乃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过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现实的个人”,当然,这个概念在这里(甚至在《神圣家族》中)还具有很强的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色彩。<sup>③</sup>但是,真正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使用“现实的个人”首先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H<sup>5a</sup>手稿中,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的误解,即将所谓的“现实的人”实际上设定为“一般人”或“抽象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进行了“唯物主义”的界定,即他“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而且这构成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sup>④</sup>通过梳理这个概念的发展史,应该看到它一直镶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中,因此可以推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个人”主要是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和想要表达的思想。换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主要是马克思的,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命名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是正当的。

总之,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笔迹主要是恩格斯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地位,只能证明梁赞诺夫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的论断即“口述笔记说”,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初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密切的思想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在马克思主导下共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责任编辑:周文升)

<sup>①</sup> 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sup>②</sup> Siehe B.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 *Wigand's Vierteljahresschrift*, 1845(3), p. 22.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6、264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